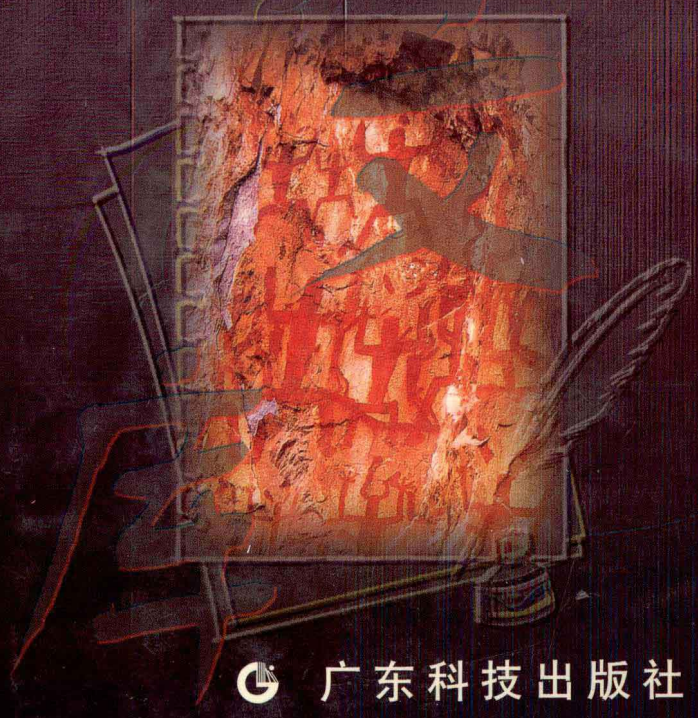


□ 主编 俞仲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建校十周年学术文库

王阳明哲学研究

高予远 著



广东科技出版社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建校十周年学术文库

主编 俞仲文

王阳明哲学研究

高予远 著

广东科技出版社

· 广 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阳明哲学研究/高予远著.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3.4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建校十周年学术文库)

ISBN 7-5359-3238-X

I. 王… II. 高… III. 王守仁 (1472 ~ 1528)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5837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码: 510075)

E-mail: gdkjzbb@21cn.com

http: //www. gdstp. com. cn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排 版: 广东科电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广东省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邮码: 516001)

规 格: 850mm × 1 168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60 千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以实践的良知为基点，分析了阳明哲学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力求揭示出阳明哲学以实践为特征的各种意义，并在良知与儒道的超越问题上，认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人固有的内在至善之良知。

序

哲学是爱智慧。

什么是爱智慧？爱智慧是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对先贤、对历史、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并以此理解为基础对生活做出实质性抉择，这一抉择就是我们的行为。

每一次这样的行为都将我们的生命带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中，一个只有你独知的领域中。在这一领域中，世界、人类、大地、时空与你处于无间的融合中，在这一融合中，你或有智慧或无智慧。所谓智慧是意味着你是否秉承、顺应了只有你独知的这一融合境域中的中正力量。

智慧就是秉承“独知境域”中那一本源意义上的中正力量，有了这一中正力量，我们的抉择才不会坠毁入危途。

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这种“独知境域”中进行抉择。每一次抉择，或有智慧，或无智慧，但无论怎么样的抉择都是你自己的抉择，不是他人的抉择，你要承担抉择后一切发生的事件，无人能代替你承担。逃避承担不仅不是智慧的，同时也不是爱智慧的生活方式。爱智者，不一定是智慧的，但承担自己抉择后的一切事件则是爱智者的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没有承担后果的爱智慧行为，永远不可能是智慧的拥有者。

自己抉择并承担抉择是一切爱智慧者本源意义上的生活

方式。只有这种自己抉择并承担由此抉择引起的一切后果的行为，世界的真实意义才可能为我们打开，一种诚实的力量将去除掉一切虚浮不实的幻象，世界的真实意义将洗净你内心的一切污秽，你将处于本源真实的中正洁净中。

每一次抉择，或智慧，或愚蠢，但无论怎样，抉择都由你自己做出，并由你自己承担抉择后的一切。先贤只是以睿智的目光作壁上观。先贤只能冷静地言：自己抉择、自己承担，没有人能代替你。

爱智慧就是你自己看着作壁上观的先贤，对现实处境中的事物做出抉择，没有现成的旅游指南为你指出坐几路公交车可以到达目的地。

爱智慧不等同于你就有智慧，只有你做出抉择了，这时才能判断你是否有智慧。

一次有智慧，不代表你终生有智慧。你仍在充满歧途的旅途中，或危坠，或走出危途。只有生命秉承中正之力，不断走出危途，智慧积累越多，我们才能逐渐接近那“善的相”，接近那“良知”，接近那先贤中的“仁”，或拥有。但拥有并不一定代表你永远都在真理之路上行走，你的抉择还有可能将你带入危途。

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先贤只作壁上观。爱智慧、有智慧，需要你看着作壁上观的先贤，在他们的光辉下，进入你未知的领域。领域永远是未知的，因为你不是上帝，不是先知。在未知领域中，作壁上观的先贤只能告诉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爱智慧，就是自己独行在“危”、“微”的路上，心秉中正而不坠入危途。

当我们沉溺于先贤的典籍中，忘了自己的抉择时，这是对生命存在的遗忘，这种遗忘恰能导致你误入危途。因为存在是你自己的存在，不是先贤的存在，先贤不能代替你存在。沉溺于先贤的典籍，是自己对自

己独知领域的无视，是舍己从人。当我们舍己从人时，你将离危坠之途不远。舍己从人，你将偏离中正之途。

中国先贤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充分揭示了我们终生都在“危”、“微”的途中独自行走。

问题是：哲学是爱智慧，我们怎样才能哲学的智慧下，在“危”、“微”的途中独自行走，减少坠毁入危途的机会？

道理只有一个：以“如临深渊”之怵惕，以“惟精惟一”的精一之力，在事物上用尽“慎独”之功。

第一章 阳明哲学的缘起与定位	1
第一节 程朱末学的博杂与个人生存实践的因顿	2
第二节 阳明哲学与宋代理学	9
第三节 阳明哲学的定位——实践的良知之学	19
第四节 写作原则与方法	28
第二章 (良知是阳明哲学的核心)	30
第一节 良知贯穿阳明思想的始终	31
第二节 良知思想是对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	41
第三节 良知思想是融合理学与心学的结果	62
第三章 良知与致良知的真实意义	70
第一节 良知的剥离	70
第二节 良知的三层含义	81
第四章 知行合一	109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109
第二节 本源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116
第三节 知行关系之辨	124
第五章 格物致良知	140
第一节 格物致知的起点与目的	144
第二节 格物致知的含义	146
第三节 格物致知的重要环节——慎独	151
第四节 格物致知与仁智	154
第五节 格物致知与其他为学工夫之关系	164
第六章 “心即理”与“性即理”	173
第一节 性、心、理的概念辨析	174
第二节 性、心、理三者之关系	191

第三节 对“心即理”与“性即理”之理解	196
第七章 四句教之哲学问题	202
第一节 首句解释	206
第二节 后三句解释	217
第三节 “利根之人”与“其次”问题	222
第四节 对四句教之评价	226
第八章 良知与儒道的超越问题	230
第一节 何谓超越	231
第二节 儒道的超越问题	234
第三节 外在超越的实质及何以可能	242
第四节 内在超越的实质及何以可能	247
第五节 内在超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安身立命之本	249
年谱	254
参考文献	256

第一章 阳明哲学的缘起与定位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阳明一生在功业与思想上皆有极大成就，被称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其学上承孔孟之旨，中经吸取陆象山、陈白沙、湛若水为学从自家心体入手之精义，并与朱熹哲学将理与心分为二的思想相对抗，最终以赤日当空之良知，发扬光大了儒学一以贯之的仁义精神。阳明良知之学，可以说是对中国儒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仁义精神的传承，其良知哲学对明代以后的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阳明可谓是朱子以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王阳明生活之时代，正是程朱理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与大多数中国士人一样，阳明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早年即知慕圣学，以成圣成贤为人生第一要义。青年时期，谒当时明儒娄谅，“（娄谅）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遂深契之。”（《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自此遍求考亭之书，“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遂取竹子格其中至理，“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阳明以朱子格物之法不得入圣贤之门，遂“自委圣贤有分”（引文均同上），乃随波逐流，随世就辞章之学。弘治十一年，阳明仍不能忘怀儒家圣学，重新研读儒学，此时虽“思得渐渍洽浹”，但终不能过“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之关，“沉郁既久，旧疾复作”，愈发认为“圣贤有分”，遂有弃儒学入二氏之意。但二氏之学也不能解决阳明思想的根本

问题，弘治十五年，阳明渐悟“仙、释二氏之非”，认为仙家道引之术是“簸弄精神，非道也”，而佛家思想则是“断灭种姓矣”（《年谱一》）。

朱子格物穷理之学不能引阳明入圣人之道，二氏之学也非先生立命根基。在此生存根基不能有所归依、有所安立的精神状态下，阳明又遭宦官刘瑾迫害，被贬谪至贵州龙场。明代贵州龙场，乃极其荒蛮之地，“蛇虺魍魎，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鸩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在龙场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阳明生命经历了极大的严峻考验，最终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自此阳明从心性上奠定了步入圣人之道精神根基。

从阳明的学术发展经历而言，阳明之学实生于困顿至极，实生于忧患。这种忧患是对儒学因程朱末学而陷于博杂支离的忧患，这种困顿是个人生存实践之困顿。

2

第一节 程朱末学的博杂与个人生存实践的困顿

宋代理学，自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之发扬努力，至朱子，终于发展至其高峰。“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①”。朱子作为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促进了理学发展，促进了理学愈发精密详实，完备宏大；另一方面也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两个较大的弊端。这两个弊端，一是源于朱子学在元明两代被作为开科取士标准的官学，一是源于朱子学愈发详密而有知识化、支离化之倾向。

作为理学集大成的朱子之学，虽一度在南宋庆元年间被斥为伪学而禁讲，但在朱子死后不久即开禁，后朱子又被朝廷谥为

^① 钱穆著. 朱子新学案. 成都: 巴蜀书社, 1986. 1

文，追封为徽国公，并于宋理宗淳祐元年，与周、张、二程一起“从祀孔子庙庭”。自此，以朱子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就开始逐渐成为被官方认定的正统儒学，逐渐成为在思想界占支配地位的官学。元仁宗皇庆年间，朱子之学被正式定为官学，明令科举要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与五经的朱子专注为标准。明代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朱子思想为主要标准，汇集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至此朱子之学全面正式取得了正统儒学的独尊地位，成为全国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思想准则。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两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与政治体制创化皆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东汉以后，中华民族历经动乱，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行的分裂与融合，再加上佛学的东渐，这一切皆使儒学虽未失去对中国社会绵延不绝之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力量与凝聚力量也一直处于衰微之势。儒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不足以构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统一力量。

两宋以后，经北宋三先生之发轫，中经周张二程之努力，终以朱子为集大成者，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儒学以其仁之生生、虚明宽和、周流不息而切于日常人伦，这种极高明而又切于现实的内在品性，重新成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动力与源泉。

儒学重新在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必然，是中国士人内在的精神要求。

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成为元明两代朝廷开科取士的标准。这一历史事件，一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合格官员，从而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朱子学作为开科取士的标准，也使儒学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与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些弊

端。这一弊端在于儒家思想概念与功名利禄相结合后，丧失了内在的精神活力，沦为利禄之人谋利的工具，这就导致儒家之学在社会层面，成为“世之号称贤士大夫者”争名逐利而又自我标榜、自我粉饰的工具。这种沦为士人逐利工具的儒学，已非是士人笃实力行的生命践履之学，非是亲民安民的外王之学。对此阳明批评道：

惟世之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而相讲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实，与其平日家庭之间所以训督期望子孙者，则未尝不汲汲焉惟功利之为务，而所谓圣贤之学者，则徒以资其谈论，粉饰文具于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全集》卷八，“书黄梦星卷”）

4 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失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全集》卷七，“万松书院记”）

同时，这种沦为利禄之人谋利工具的儒家思想，不仅自己失去了向前拓展的生生活力，而且也成为一种禁锢，一种妨碍人们真实理解生活的禁锢，这一禁锢在禁锢人的生命自身的同时，也禁锢了儒家思想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先贤思想的继承融贯与创新。

功利之说日侵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全集》卷七，“书林司训卷”）

功利之相侵，致使儒生陷于功利而不自知，失去了儒学之

诚，则对三代精神之继承也就成为难乎其难之事。

在朱子之学沦为利禄之人谋利工具的同时，朱子学也因其愈发发详密的知识化体系，而有博杂之倾向。这种博杂之倾向首先源于朱子学自身之特点，后因朱子学成为开科取士标准而愈发加重了这一倾向。

朱子在哲学上主张格物穷理，认为物物皆有一理，一物之理未尽，则我们的知就有未明。这种哲学思想，在朱子自己身上就体现为朱子一生非常注重对儒家经典编著与注疏。朱子一生编著注疏的书籍甚多，有《诗》、《书》、《易》、《礼》、《通鉴纲目》、《孝经刊误》、《四书或问》、《四书章句集注》、《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上蔡语录》、《太极通书解》、《近思录》、《西铭解》等等。一系列的编著注疏活动奠定了朱子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绝对地位，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与传播。但其弊在于我们人在从事如此繁杂宏富之学术事业时，若无居敬之心常涵养中正明觉的祥和心体，若无在事上持守此祥和明觉心体之敬，则心体有陷入博杂支离外放之弊端。这一弊端虽在朱子身上未有体现，但其宏富繁杂之为学风格，则使朱子以后的儒学有陷入博杂支离之倾向^①。其后，朱子思想成为元明两代全

5

① 对于朱子学的这一特点，阳明的一段论述甚有助于我们体会其中意味：“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乎？独其平日汲汲于训解，虽韩文、《楚辞》、《阴符》、《参同》之属，亦必与之注释考辨，而论者遂疑玩物。又其心虑恐学者之躐等，而或失之于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无不明，然后有以实之于诚正而无所谬。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烦，而失之愈远，至有弊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为，则亦岂至是乎？”（《年谱一》，《全集》卷三十三）也即在朱子自身未曾有支离之蔽，但其学术功业之宏富，在其后学身上则有支离之蔽。

国士人科举考试的标准，将其知识化、条理化以利士人有一明确的思想准则去参加科举，也成为当时朱子思想发展的必然。故由于朱子学自身之特点与社会科举之需求，其必然导致当时以朱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走入外放的博杂支离之末途。

功利、博杂、支离，这一切皆肢解了儒家中正祥和纯粹的统一精神力量，儒家之学已非是儒生修身养性、亲民安民的内圣外王之学，儒家之学在此肢解中，沦为士人争相逐利粉饰的博杂虚伪之学。

世之学者，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探蹟而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非无所谓深造之者，然亦辞章而已耳，训诂而已而，技艺而已而。非所以深造于道也，则亦外物而已耳，宁有所谓自得逢源者哉。（《全集》卷七，“自得斋说”）

这种博杂之学，不仅不利于学人深造以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适以长其敝。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教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臬、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柄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

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
呜呼！可悲也已！（《传习录》上）

儒家之学，从其本质而言是生命的践履之学，一种在具体的历史境域中，生生不息的日新复日新的创化新生之学。当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作为科举标准与功名利禄结合从而导致儒学发展失去内在动力之时，从儒家内在精神动力而言必有一种对此学术状况的反动。阳明良知之学的产生，正是儒家内在日新复日新精神动力的必然结果。

对已有学术思想禁锢的冲破，有两个可供凭借的源泉，一是在新的具体境域中对先贤的重新理解与解读；一是立于诚明无欺的生命践履中。而对先贤真正的重新解读，也必是立足在诚明无欺的践履中，这种解读，才能真正融化成为生命存在的真实组成部分。

对儒学功利、博杂支离的忧患，终因阳明自身个人生存的困境，而有一学术思想上的大突破。

中国儒学在为学为人上，极其重视一“诚”字。“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与“诚之”在中国儒学思想中，占有着天之道与人之道这样具有本体意味的地位。但人生而在世，生而就有功名利禄裹缚心体，要真正达到无私欲自欺之至诚之界，则也是一件极其不易之事。

阳明因宦官刘瑾弄权，被贬谪至贵州龙场。此次贬谪，为阳明获得了一次破除内私欲而达内心至诚之界的重要契机。在这一极其荒蛮之地，阳明独自面对恒古之自然，个人生存处于一种极度困境中。在这一困境中，已有的一切裹缚皆失，面对困境，面对生命，我们无法自欺，也不能自欺。在这种无法自欺，也不能自欺中，生命处于一种极其虚明明诚中，正是在这种虚明明诚中，阳明默记先贤经典，重新解读先贤，切于其当时生存处境，

念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终大悟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虚明明诚的生命践履中，在于我们独知亲知的良知中。

忧患与困，揭示出已有精神根基的未安处、未精处。在忧与困中，必须重立生存明觉无欺之根基，若此心体才能有所安、有所立，故困是一切思想向前突破的动力与源泉^①。阳明也正是在这种困中，明解决朱子学弊端之枢要。

阳明因对朱子学的忧与个人生存的困境，终使阳明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以良知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解决程朱末学功利、博杂支离之弊。以良知为我们为人为学的根基，我们则可在日新复日新的亲知与独知中，在最直接真实无妄的生存明觉中，理解先贤切于人之生存的义理精义。以此良知之亲知与独知，虽在繁杂中，处功利之事，我们心体也不失明觉祥和的精一之力，不失天理之昭昭^②。此是阳明因忧与困，立良知以解朱子学弊端之意义。

阳明以良知为安身立命之根基，重新使儒家之薪火相传，重新使儒家生命根基立在中正明觉的生生仁义中，立在诚明无欺的生命践履中。在独知、亲知的良知中，在最纯粹明觉无欺的生发中，自可破除功利、博杂、支离对生命之裹缚。

① 阳明虽在去龙场之前已与湛若水有倡身心之学之思想，但思终未达圆通之界。惟因有在龙场之困，才终以良知为吾人安身立命之根基，解决了朱子为学支离之蔽。

② 如阳明认为：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一切屏绝”之说，是犹泥于旧习，平日用功未有得力处，故云尔。请一洗俗见，还复初志，更思平日饮食养身之喻，种树栽培灌溉之喻，自当释然融解矣。（《全集》卷四，“与陆原静”）此处阳明所言的果无功利之心即其所谓的良知也。